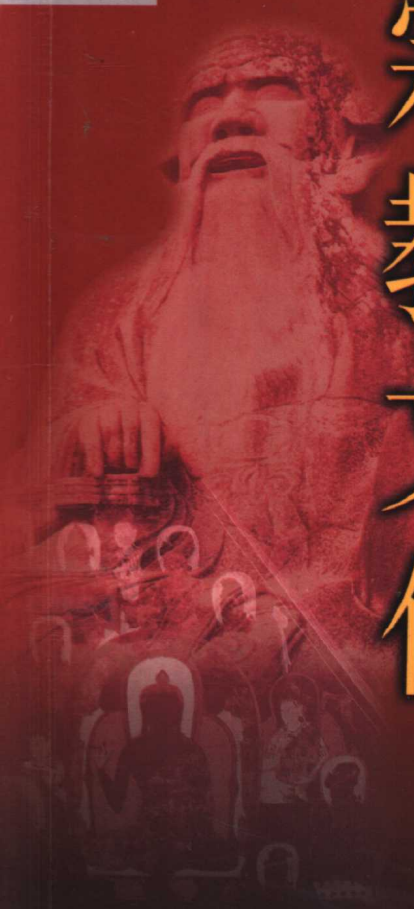




福建

宗教文化

何绵山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福建宗教文化

何绵山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宗教文化/何绵山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3
ISBN 7-80688-064-X

I. 福… II. 何… III. 宗教文化-福建省-文集
IV. B928.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471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天津雍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简介

福建宗教以其独特的形态引起了海内外有关人士的长期关注和兴趣。本书从各个方面揭示了五大宗教在福建的发展和特点，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凸现了其文化内涵，并探讨了闽台宗教之间的历史源流和天然联系。

The Religious Culture in Fujian Province

Abstract :

The Religions in Fujian arouse great interest of people concerned from home and abroad for a long time. This book illust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five religions in Fujian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reveals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robes into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ligious connection between Fujian Province and Taiwan Province.

作者新著

- 《闽文化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八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闽文化述论》，延边大学出版社
《闽台经济与文化论集》，厦门大学出版社
《台湾的建筑》，九洲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赏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探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古代诗词鉴赏》，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文化概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台湾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丛谈》，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建经济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闽台经济与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福建历代作家评传》，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台区域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佛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	(5)
再谈佛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	(22)
佛教与福州社会文化	(37)
福建禅宗源流	(50)
弘一大师与近代闽南佛教	(57)
近代四大高僧与福建佛教	(80)
闽南佛学院发展历程及办学特色	(100)
闽台佛教关系	(109)
道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	(116)
道教对福建民间文化的影响	(123)
道教与福建社会文化	(130)
闽台道教关系	(145)
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	(151)
基督教与福建社会文化	(158)
闽台基督教关系	(169)
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	(176)
闽台天主教关系	(195)

伊斯兰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	(199)
伊斯兰教与福建社会文化·····	(208)
福建宗教五十年·····	(217)
闽台宗教的历史联系和现实交往·····	(240)
福建宗教建筑艺术·····	(265)
闽台寺庙建筑艺术源流·····	(274)
重返林阳寺·····	(278)
千年名刹龙泉寺·····	(283)
何绵山近年发表有关福建宗教文章目录·····	(286)
后记·····	(290)

前 言

福建历来是一个宗教大省，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五大宗教在福建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群众影响。目前可统计的教徒共有 100 余万人，宗教活动场所近 7000 座。

福建佛教目前共有寺庙 4300 座，僧尼 12000 多人，居士约 13 万人，无论寺庙数和僧尼数均在全国大陆汉族地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福建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庙有 14 座，约占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寺庙 10%，它们分别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福州怡山西禅寺、福州金鸡山地藏寺、福州瑞峰林阳寺、闽侯雪峰崇圣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厦门南普陀寺、宁德支提山华藏寺、莆田南山广化寺、莆田梅峰光孝寺、莆田囊山慈寿寺、泉州开元寺、晋江龙山寺、漳州南山寺。

佛教在三国时期传入福建，至今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福建历史上高僧辈出，曾来福建传法的外省高僧和福建籍高僧，著名的有：来建阳建寺的唐代四川人道一，制定了“百丈清规”的唐代福建长乐人怀海，与弟子共创沩仰宗的五代福建霞浦人灵祐，创建雪峰寺的五代福建南安人义存，鼓山涌泉寺开山祖师五代渤海人神晏，主持鼓山涌泉寺 23 年的明末曹洞宗最有影响的禅师福建建阳人元贤，弘法闽南 14 年的近代浙江的弘一，曾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近代浙江人太虚，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福建古田人圆瑛等。

福建佛教与台湾地区以及日本、东南亚关系密切，源远流长。明末清初，福州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与台湾僧侣交流极为频繁，香火远播台湾。唐代，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

在福建霞浦县赤岸登陆，经福州住开元寺北上长安求法。清初，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率20余人东渡日本，开创日本佛教黄檗宗。福建许多寺院在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设有众多下院。直至现在这些国家的佛教领袖仍然多为闽籍僧人，同福建佛教界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福建寺院刻经历史悠久。宋代福州东禅觉寺所刻《崇宁藏》和开元寺所刻《毗卢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寺刻大藏经。福州鼓山涌泉寺曾成为刻印佛典经书的中心，直至“文革”前，尚存明清及近代各种佛典版片11375块，弘一大师生前曾称其为“皮藏佛典古版之宝窟”。其他一些著名丛林也珍藏了各种佛典，如泉州开元寺就藏有宋元版佛典21部。历史上福建因寺院众多和远离战乱，一些佛教文物保存相对完整，有代表性的如摩崖石刻、碑文经幢、稀世佛像、各类佛塔等。

福建道教现有宫观600多座，道士2600多人。道教在福建的产生与名山有关，武夷山被称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中的第十六洞天，霍童山被称为道教三十六洞天第一洞天，闽东的太姥山、闽南的清源山、福州的于山等，都与道教关系密切。福建现存著名道教宫观，有福州的九仙观、裴仙宫、福清石竹山道观、泉州元妙观、武夷山桃源洞道观、莆田东岳观等。

道教在东汉时传入福建，宋代有炼养派和符箓派，明清时，有全真道和正一道。全真道主张“出家修真，炼气养神”，至近代后开始衰落。正一道画符降妖，祈福禳灾，为人驱邪超度等，人称“师公”。福建道教法事名目繁多，科仪完整，其驱妖镇魔的一些动作，有时具有很强的技艺性和观赏性，因此常被借用到舞蹈中。

福建道教与台湾道教同源同流。福建南部移民入台湾开发，将家乡宫庙香火带入台湾，所供奉的神灵为两地共有。东南亚的闽籍先民对家乡的神祇特别虔诚，视为他们在海外生存、发展的保护神，在建立庙宇时，总要冠上故乡的地名或祖庙的名称，并经常回到故乡祖庙进香。

福建天主教目前有教堂300多座,神职人员130多人,教徒近30万人。著名教堂有:福州泛船浦天主堂、长乐城关天主堂、厦门鼓浪屿天主堂、漳州东坂后天主堂、龙海岭东天主堂、福安城关天主堂、穆阳天主堂、宁德三都澳天主堂、城关天主堂、岚口天主堂、邵武东门天主堂、建瓯腊子坪天主堂、上杭城关天主堂等。

天主教早在元代就传入泉州,是全国天主教传播最早地区之一。公元1313年,泉州成立了刺桐教区,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教区之一,负责包括杭州、扬州等通商口岸在内的东南教务。现存于泉州海交馆中的元代十字架墓碑石中,有5方是元代泉州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墓葬的遗物。明代,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到福建传教,因善于将其教义与中国传统习惯相结合,因此传教顺利。明末,传统文人和僧人联合反教,纷纷著文“辟邪”,由漳州人黄贞将其汇编为《破邪集》。清初,福安人罗文藻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教,在官方规定外国传教士不得传教的年代,罗文藻成为全国惟一能公开传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1696年福建正式成立天主教福建教区。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使福建最早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交汇地区之一。

福建基督教目前共有教堂1700多座,教牧人员1200多人,教徒47万,另有慕道友14万人。较有影响的基督教堂,有福州花巷堂、铺前堂、天安堂、苍霞堂、福清城关堂、莆田城关堂、南平梅山堂、晋江安海金升堂、泉州南街礼拜堂、厦门三一堂、新区堂、新街堂等。

基督教传入福建的时间约在1840年前后。1848年,厦门建立第一座教堂——新街礼拜堂,解放前被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称为“中华第一堂”。基督教由此开始从厦门、福州向全省各地辐射。基督教在福建创办了医院、学校,出版报刊、书籍,并促使了闽南白话字的产生。

伊斯兰教在福建目前有代表性的清真寺有5座,最有名的是建于北宋年间的泉州清净寺,也称圣友寺,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

伊斯兰教寺之一，它以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为主，在许多建筑部位上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技艺。其他四座为厦门清真寺、福州清真寺、邵武清真寺、晋江陈埭清真寺。全省教徒有 3000 多人。

伊斯兰教在唐代就传入泉州，当时有不少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进入泉州，以后有部分定居下来。宋代，许多海外来的穆斯林在当地娶妻生子，代代相传。穆斯林为了满足自己宗教生活的需要，开始建造清真寺。元代随着泉州成为世界贸易大港，伊斯兰教在泉州有很大发展，又修建了许多清真寺，只是今天已不存在了。明代，伊斯兰教开始在邵武发展；清代，由于泉州港的没落，海外穆斯林已不再来，而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与内地穆斯林联系也多不方便，所以此时福建伊斯兰教不如宋元时期兴盛。

福建穆斯林来源广泛，除了宋元时代从海上丝绸之路来此定居以外，还有由北方南下经商的，外省来福建任职的，受聘为阿訇或投亲、居官等从全国各地来的，加上多次迁移，福建穆斯林居住分散。除极少数几个点外，只见大分散，难见小集中。

福建独特的宗教形态长期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兴趣。笔者尝试在书中从各个方面揭示五大宗教在福建的发展和特点，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凸现其文化内涵，并力图阐明闽台宗教之间的历史源流和天然联系。

佛教在福建的传播和特点

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一带,西晋之际,佛教就传入闽地。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安郡太守严高在郡北无诸旧城(即今福州市)建造绍因寺(后改名乾元),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寺院。寺名绍因,有“继承”意义,可能在此之前福州已有佛寺。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南安九日山建造了延福寺,为福建省第二座佛寺。南北朝时期,福建佛教有进一步的发展。宋昇明至南齐永明,在20多年时间里,福建所建寺如侯官明空寺、妙果寺,长溪(今霞浦)建善寺,松溪资福寺等,此时佛教已由闽中向闽北、闽东传播。梁武帝时“全省共建佛寺28所”(魏应麒《五代闽高僧与神话考》),并开始建塔,福建尼庵的建立也由此开始。闽县(今属福州)的法林尼寺,建于梁大通元年(527年),正如《三山志·寺观》记载:“闽中尼寺自此始。”陈朝时福建建寺30座。陈永定二年(558年),莆田郑生创建了广化寺前身金仙院。同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挂锡延福寺三年,翻译佛经,由此拉开福建译经的序幕。

隋代福建共建寺12座,佛教继续在闽东、闽北、闽南传播。隋初,陈后主之子镜台到永春避难。隋开皇九年(589年),莆田金仙院升寺,由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无际禅师任寺主,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修持《法华经》,大弘天台祖业,剃度僧徒百人,授三皈弟子万众,是传天台宗的一代名僧。

唐代福建佛教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全省新增寺院735所,但发展不平衡。主要在闽中、闽东、闽北,闽南也趋于兴盛。唐代佛教传入福建有多种渠道,如三明地区就有远方僧人到此隐居修行而进行传播,从江西各寺庙传入,由广东经汀州传入,由闽中传入等,因此既有整体性,又有独立性。唐代福建高僧辈出,一些高僧如怀海、希运、

灵祐、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福建名刹林立,一些在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大都是建于这一时期。如建于唐建中四年(783年)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建于唐咸通八年(867年)福州怡山西禅寺、建于唐乾宁元年(894年)的福州金鸡山地藏寺、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年)的闽侯雪峰崇圣寺、建于唐中和元年(881年)的莆田囊山慈寿寺、建于唐长庆二年(822年)的泉州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三山志》卷三三《寺观》称当时造寺“穷殫土木,宪写宫省,极天下之侈矣”。可见这些寺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

五代闽国,福建“佛法独盛于其时”(《鼓山志》卷七《艺文·碑序》)。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闽王王审知“雅重佛法”(《十国春秋》卷九一《闽一·世家》),全力扶持佛教。光化三年(900年),王审知在福州乾元寺开坛,度僧2000人。天复二年(902年),他在福州开元寺建戒坛,度僧3000人。天祐三年(906年),他在福州开元寺铸丈六高铜佛像一座,丈三尺高菩萨2座;越年,又设20万人斋于开元寺,号曰“无遮”。同光元年(923年),为庆祝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王审知建太平寺,铸释迦弥勒像,又作金银字四藏经。王审知还特地命人浮海运木料到泉州建造仁寿塔(西塔)。闽国王氏家族对佛教也极为热衷,王审知子王延钧于天成三年(928年)在福州开元寺开坛,度僧2万人。后晋天福元年(937年),高祖石敬瑭在福州再次度僧11000人;940年4月,王曦度僧万人,连偏远的顺昌县亦有百余人受度。其侄王延彬在出任泉州刺史的16年中,优礼僧人,大造佛寺,对泉州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王氏据闽时共新增寺院706座,连经济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孤岛厦门,也由僧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正如志书记:“闽佛刹千有余区,本其兴废,皆王氏织其协力奉教。”(《鼓山志》卷七《艺文·碑序》)南宋人黄干在《勉斋集》卷三十七中记道:“王氏入闽,崇奉释氏尤甚,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当时福建僧人猛增,据《三山志》载,仅福州一府的僧尼就达6万多人,福州鼓山涌

泉寺、怡山长庆寺、闽侯雪峰崇圣寺的僧人均多达一二千人。当时高僧云集，僧人地位空前提高，如雪峰义存常被迎进节度使府为僚属官将说法，官府斋僧建寺都咨请他决定。王氏在经济上对佛教也大力支持，如福州鼓山涌泉寺，王审知“所施膳僧之田多至八万四千亩”（《鼓山志》卷五《田赋》）。统治者还以法定的方式，使寺院占有肥沃土地。当时一些贵族和富豪也带舍田入寺，“是时膏腴田尽入寺观，民间及得其饶窄者，如王延彬、陈洪进诸多舍田入寺。顾窃檀施之名，多推产米于寺，而以轻产遗子孙，故寺田产米比民业独重”（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一《田赋》）。莆田、仙游两县许多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

宋代福建佛教愈加兴旺，其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淳熙《三山志》卷四十称福州“金银福地三千界，风月人居十万家”。福建寺院“至于宋极矣！名胜地多为所占，紺宇琳宫，罗布郡邑”（《八闽通志》卷七五《寺观》）。仅福州府，庆历中（1041—1048年）有寺1625座；绍兴中（1131—1162年）有寺1523座。这些寺院不仅占好地，而且建得富丽堂皇，“祠庐塔庙，雕绘藻饰，真侯王居”（《三山志》卷三三《寺观》）。宋吴潜叹云：“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二《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仅泉州，宋初“寺院之存者凡千百数”（《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连闽北建州，寺院也近一千座。这是因为许多“富民翁姬，倾施贲产以立院宇者亡限”（《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观》）。寺院经济发达，占据许多良田，正如时人韩元吉在《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建宁开元禅戒坛记》所云：“闽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许多达官文人都喜在寺院中设立自己读书处，以便在攻读之余和高僧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如南宋名相李纲在绍兴元年（1131年）曾为邵武同乡宋禅师在泰宁建了寺庙而作《瑞光丹霞禅院记》。一些名人也以游寺为乐事。朱熹曾多次游寺，并多处题写对联，如为漳州开元寺题：“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为南安雪峰寺题写：“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

江山常在掌中看。”两宋时期福建僧尼之多，亦为全国之首。仅福州，“农家之子去而从释氏者常半夫焉”（卫泾《后乐集》卷十九《福州劝农文》）。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福州东禅院僧冲真在城东报国寺举行法会，“斋僧尼等至一万余人，探闾分施衣、巾、扇、药之属”（《三山志》卷四十《土俗》）。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止，这种每年一次的大型法会共举行了49次。宋谢泌在《长乐集总序》写道：“潮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全宋诗》卷五十四，北京大学出版社）连闽清小县，宋代最盛时亦有僧尼260人，宋理宗还为闽清白云寺御书“白云山”三字，竖碑于寺前。僧尼在闽南一带也发展迅速，“至道元年（995年）六月……是岁太宗阅泉州僧籍已度数万籍，未度者犹四千余”（《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使皇帝为之惊骇。据《泉州府志》记载，仅泉州市区，就有“僧侣六千”，以至朱熹为泉州开元寺写了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宋代福建被朝廷赐号的僧人为数不少，如赐号“真觉禅师”的省澄、赐号“慧日禅师”的文矩、赐号“法慧大师”的行通、赐号“悟空大师”的清豁、赐号“法济大师”的道岑、赐号“文慧大师”的法周、赐号“真觉道者”的志添、赐号“昭应广惠慈济善利大师”的普足、赐号“昭觉大师”的子琦、赐号“灵应大师”的道询等。据《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福建僧尼为“七万一千八十人”。以至时人黄干指出：“髡其首而游于他州者，闽居十九焉。”（《福州府志》卷十四《风俗》）

元朝，统治者热衷于念经、祈祷、印经、斋僧等各类佛事活动，并大建塔寺以修功德。所以福建元初虽经战乱而毁废了不少寺院，但在短期内又开始发展。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僧澄鉴重兴毁于战乱的宁德支提寺，历时15载告竣。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率军远征爪哇，从后渚港放洋，因无功而还，受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亦黑迷失由此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佛典。延祐二年（1315年），释觉琳在建阳

县后山报恩寺万寿堂雕印《毗卢大藏经》，亦黑迷失全力支持并亲任劝缘主。翌年，他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指定全国一百座大寺，“各施中统钞一百定，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福建通志》第四十五册）。并将田租二千石，散施泉州、兴化各处寺院，以作看转藏经之资。亦黑迷失指定的一百座寺中，福建占了32座，其中泉州有17座，故《金氏族谱》附录《丽史》称泉州为“僧半城”。泉州开元寺在元代有上千僧人，昌盛一时，正如《泉州开元寺志》称：“历五代而至宋，旁创支院一百廿区，支离而不相属。至元乙酉（1285年），僧录刘鉴义白于福建省平章伯颜，奏请合支院为一寺，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明年延僧玄恩主持，为第一世，禅风远播，衲子竞集。复得契祖继之，垂四十年，食常万指。”元代福建名僧有谥号“广明通慧”的普济禅师，有赐号“佛心正悟大师”的契祖，赐号“佛果弘觉大师”的如照等。

明代，福建佛教再次兴旺。由于寺院占有大片良田，又拥有免除各种赋役的特权，所以不少民田被施与僧人。明人蔡清曾说：“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举福建又以泉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蔡文庄公集》卷一《民情四条答当路》）仅建宁一府，就有一半的农田被寺院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宁已出现了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僧令司”，并已有寺庙一百余座。明神宗母亲慈圣皇太后，自号“九莲菩萨”，曾于万历元年（1573年）请宁德的支提寺大迁法师入京讲法，居住慈寿寺，八个月后还山。万历十八年（1590年），太后敕赐全藏678函和金冠、紫衣、黄杖、龙凤旗等物，三年之后，太后还传旨慰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太后谕以金铜合金铸造一尊重达千斤的毗卢遮那佛像送到支提山供奉；二十七年（1599年），神宗又命太监赵永奉送《藏经》进山。这种殊荣促使各地官员钦敬，大众膜拜。当时宁德地区不少文人学者，都成为在家子弟。支提寺的天思法师于万历年间被请到福州开元寺讲法，听众达千余人。这时宁德地区建寺已从沿海往山区发展，一些僻远的山区如寿宁、周宁、柘荣等地建寺数量激增。明万历年间，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鉴源、镜源赴京请《藏经》，得宰相叶向高帮助，朝廷赐《藏经》678函，紫袈三袭，同时赐额，改名为“万福禅寺”。闽南一带佛教发展不太平衡，明嘉靖后，官府把寺院经济作为缓解“军储告匱”的主要渠道之一，甚至变卖寺产以充兵饷。一些豪强世族也伺机侵夺寺产，使一些寺院僧逃寺荒。如泉州开元寺、承天寺被军队占领，一度变成锻造兵器的场所。但闽南一些寺院却依旧香火旺盛。《九仙临降谱》卷二记载，福州鼓山密宗派道盛和尚曾于明弘治年间，主持德化大白岩，授徒18人，自成“九仙派系”，其徒并分往尤溪、大田、安溪、永春、同安、龙溪、泉州、沙县等，又分布到全省89个寺、岩、庵、庙传教或住持。一些偏远的地区，佛教也不同程度地发展，如上杭的佛教活动颇兴盛，仅紫金山就先后建有中峰寺、五龙寺、麒麟殿等，僧人达二百余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上杭开始设僧会司，理佛教事务。明末，由于福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一些文人不满意时政而归隐林泉，促使寺院发展。厦门岛上的文人学士与高僧隐士谈禅论佛，往来无间，有些人还积极参与拓建寺院，如万历年间，名士林懋时开拓虎溪岩，正德间（1506～1521年），觉光和尚大规模扩建普照寺，使厦门佛教粗具规模。

清初，一些不满异族统治的人士遁入空门，但身入佛门而犹眷念故国。其中著名的如惠安的如幻，本为明诸生，当清兵下剃发令时，出家于平山寺，以后住锡于南安雪峰寺，成为闽南的一代高僧。福清黄檗寺的隐元，在明亡后，“登坛为衲子说戒，追念国恩，泪应声落，四众咸为饮注”（《雪峰如幻禅师瘦松集》，《黄檗隐老和尚衣钵塔记》）。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元贤，多方设法庇护明末遗民，并写下了“满朝袍笏迎新主，一领袈裟哭旧王”的沉痛诗句。郑成功据厦抗清时，东南沿海一批忠臣义士流寓厦门，他们或托迹山林，或削发出家，较著名的如阮文锡、姚翼明、杨秉机、林英等三十余人，由此极大促进了寺岩的开拓和建设。清初的厦门寺岩，除虎溪岩和醉仙岩外，几乎所有的现存厦门寺岩，如万石岩、中岩、太平岩、云顶岩、宝山岩、碧泉岩、寿山岩、万寿岩、紫云岩、鸿山寺、金鸡亭、日光